

以 1950 年李彌將軍領導滇緬邊區作戰探討「黃埔精神」的內涵與

體現

鄒琮隆

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

摘要

1949 年國府於國內遭受中共叛逆挑戰，李彌（1902-1973）將軍則率部於雲南、緬甸邊區建立反共基地。在國家處與如此逆境下，滇緬邊區國軍部隊後繼無援。各級幹部領導所屬官兵弟兄發揮「黃埔精神」，在緬甸政府軍及共軍威脅的窘迫環境中堅立一隅，積極反攻大陸並收復雲南地區，雖因共軍兵力壓迫及國際諸多因素撤回臺灣，但仍因其反攻作戰讓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飄揚於大陸國土。

「黃埔精神」內容於 1959 年，由蔣中正先生闡述其內容：「黃埔精神就是犧牲的精神、團結的精神、負責的精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創建後，藉由教育與訓練將「黃埔精神」灌注於每位學生心中，以建立國軍骨幹貫徹中央命令執行北伐、剿匪、抗日及戡亂等作戰，確保我中華民國之國祚。

關鍵詞：黃埔精神、滇緬邊區、李彌將軍

壹、前言

「黃埔精神」一詞係源自於孫中山先生對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以下簡稱軍校）第一期學生開訓講話時所提，而「黃埔精神就是犧牲的精神、團結的精神、負責的精神」[1]內容是 1959 年由蔣中正先生所闡述。然「黃埔精神」由軍校透過對軍校學生（以下簡稱軍校生）教育與訓練孕育而生，並透過「黃埔精神」的發揮，領導國軍經過東征、北伐、剿匪、抗戰及戡亂期間諸多戰役，亦獲得豐碩戰果更確保中華民國得以永續發展。惟「精神」包含意識、思維及神智等非具體之內容，故作者以軍校創建、教育方向論述「黃埔精神」由來，另引用國軍將領率軍作戰史實論述說明其具體作為，期能使讀者更能體認「黃埔精神」內涵。

1949 年（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在中

共叛亂及面臨美國斷絕經濟、軍事援助的窘困狀況下，被迫退處臺灣。而國軍部隊與共軍交戰失利遭追擊打壓，僅能退守大陸西南四川、貴州、西康、雲南、廣西等各省。隔年，在國家、民族大義下，遭軟禁釋放的李彌將軍不怕犧牲，奉國家之命，在艱苦無援的滇緬邊區率領（團結）舊部練兵與共軍數度交戰，這種負責任的舉措乃是受黃埔軍校之「黃埔精神」所陶冶而成，最後雖在國際壓力下退出滇緬地區，但期間反攻雲南使國人再次眼見國旗飄揚於大陸國土團結國人向心，誠屬可貴。筆者期藉此研究，使國軍幹部瞭解「黃埔精神」內涵，達成效忠、捍衛中華民國、完成三民主義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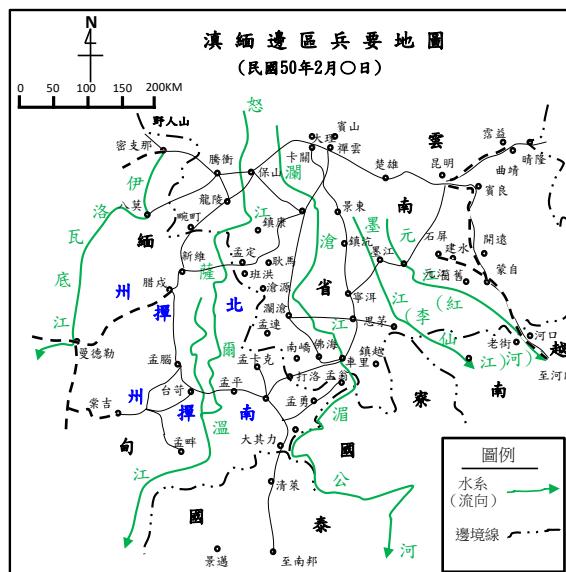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自上任以來，對我國的「統一戰線（簡稱統戰）」工作提出一系列作法及部署。特別在「一國兩制」

架構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除了互動更加頻繁、關係更密切外，更強調「適應新情勢，切實做好對台工作」。^[2] 由此可見，中共即使近年來針對兩岸人民交流釋出許多優惠方案，但從根本上從未曾放棄或減少對我國的各項統戰工作。

反觀國人近年來因中共當局的製造的糖衣毒藥所蒙蔽，殊不知現今兩岸和平、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是以國防實力為後盾所換來的。國軍官兵是國防的基礎，而一支有優良傳統的軍隊除了具備軍事專業外，對於其「一以貫之」的傳統是要能建立與傳承，現今年輕世代的軍官在國家教育改革的影响之下，對於國軍的歷史已逐漸淡忘甚至未曾接觸。「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告訴我們瞭解歷史的重要性，國軍也應該要藉由瞭解黃埔創建的歷史，及「黃埔精神」陶鑄與戰場上之體現，來使身為軍事專業人員的軍人瞭解其肩負的責任與義務。

貳、李彌將軍生平與「雲南反共救國軍」成立

1949 年國民革命軍(以下簡稱國軍)在大陸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以下簡稱共軍)交戰接連失利，蔣中正先生於 1 月 21 日主動引退下野，雖由李宗仁(1891~1969)代行總統職權，但整個中央政權是處於不穩定的狀態。4 月，共軍渡過長江並攻佔南京首都，11 月攻佔桂林和重慶，中央政府自南京遷至廣州又西遷至重慶最後再遷成都，而代理總統李宗仁則於 12 月經由香港飛往美國避難。中央政府原意再遷至滇省昆明，後因「盧漢投共事件」^[3]而停止。國軍第八、二十六軍遭共軍追擊而進入滇緬邊區(以下簡稱邊區)避難整補，所謂邊區其範圍東自瀾滄江至湄公河、西臨怒江至薩爾溫江、北沿中國滇緬邊境、南迄泰國與緬甸國界之間區域。^[4]



圖一:滇緬邊區兵要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滇緬邊區游擊戰史(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 年 4 月)。

一、家世簡介與領導「雲南反共救國軍」前軍旅

李彌，字炳仁，雲南省蓮山人。其父親李明道急公好義、望重鄉里，為里人所敬仰。李彌生於 1902 年，早歲畢業於騰衝縣立中學。求學期間嘗讀古今名將及孫中山先生學說，畢業後適逢國內各地軍閥割據，親見雖民國肇建，卻仍因軍閥、黨派系鬥爭導致人民無法安居樂業，故而立下以身許國，致力革命之志。1923 年投身軍旅，為滇軍第七師師長李根源所部連長，並在此時為滇軍協力中央剿寇平亂有功，繼而投考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科。並於 1926 年畢業後，先調任入伍生團見習，半年後進入第三軍軍官教育團中尉排長，繼轉役於第二十軍，1928 年因剿共有功再調任第二十二軍第一師第二團營長。至 1930 年，積功升至第五十九師第三五〇團上校團長，為同期同學中獲得兵柄之第一人。同年秋，李彌率兩個營兵力於湘西擊潰共軍由賀龍及葉挺所部萬餘人，自此展露其領導及用兵長才。^[5]

「中日戰爭」期間，在棗宜、湘北、桂南諸會戰中均有傑出表現，特別於崑崙

關戰鬥時，擔任第五師副師長職務帶領部屬作戰最終全師而還，立下諸多戰功，並在 1940 年升任第一師師長。至此，李彌有感於國家栽培而更戮力於本務工作。1944 年擔任第八軍副軍長期間，奉命配合盟軍作戰打通中印公路，親率第八軍主力渡過怒江擊潰日軍第五十六師團將敵軍全數圍殲，此舉獲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 1897-1989）將軍備致讚賞，更因此名揚中外。抗日戰爭結束後，升任整編第八軍軍長調派至山東進剿於沂蒙山區的共軍作戰，於 1947 年因共軍以強大兵力圍攻南麻國軍，國防部令整編第八軍前往馳援，李彌率部親臨前線與敵逐屋格鬥，寸土必爭。是役共軍傷亡二萬餘人，李彌所部傷亡亦達三千餘人的慘烈戰況。[6] 戰後，第八軍因作戰有功由李彌奉命擴編為整編軍同時任命該軍軍長，並於隔年升任第 13 兵團司令（仍兼任整編第八軍軍長）戍守雲南地區。[7] 迄 1949 年 12 月，李彌任雲南綏署所轄第六編練司令部司令（兼任第八軍軍長），因盧漢（1896-1974）叛變而遭到軟禁，所幸後由同袍搭救得以獲釋，經由海南島飛赴臺灣向蔣中正先生述職。同時，於接獲舊部於邊區實施游擊作戰消息後，親向中央請纓前往滇、緬邊區收容舊部，並提出「在西南邊區建立反共基地，進行敵後反攻活動」，[8] 俾為收復大陸國土之準備。

二、「雲南反共救國軍」成立及其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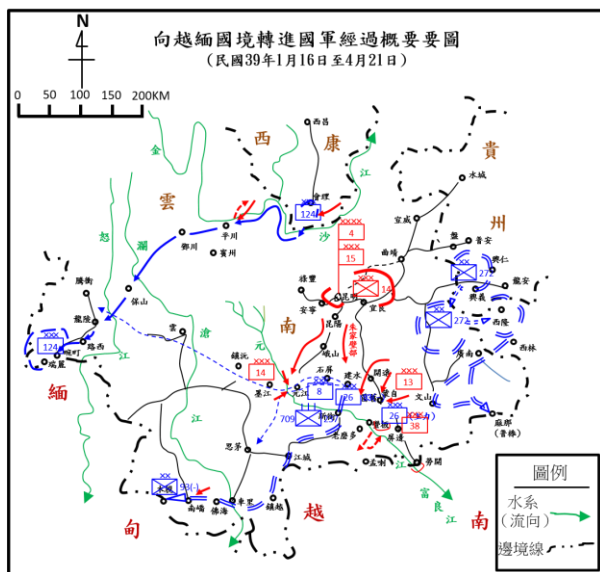
1949 年戡亂戰局逆轉，中共幾已佔據中國大部土地。11 月底貴州省淪陷，雲南與省政府主席兼雲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見大勢有利中共，私下與中共洽和預謀叛變。在此前提下，盧漢有計畫的削弱地區內國軍力量，首先命令第二十六軍第一九三師及第一六一師分別調往康滇、桂滇邊區清剿共軍，並同時調整雲南省各縣 15

個保安團集中於昆明周邊地區。並於 12 月 9 日扣押在地區內西南軍政長官張羣（1889-1990）、李彌、第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1902-1955）等重要軍政幹部，並以李、余等人名義聯合向中共宣布叛國通電，隨後宣告投共。[9] 國軍最高統帥部在確認盧漢叛變後，即下令第八軍（由原副軍長曹天戈升任軍長）、二十六軍（由原副軍長彭佐熙升任軍長）圍攻昆明，而盧漢為化解國軍圍城壓力，於 16 日同意以李彌夫人及部屬柳元麟（1906-1997）為人質釋放李彌。統帥部得知李彌獲釋後，任命其擔任雲南省主席並率所屬加速反攻昆明，俾使余程萬師長及同袍等得以早日脫險歸來。國軍官兵為營救仍被押之同袍，士氣高昂連戰皆捷包圍昆明城。最後盧漢以釋放余程萬為由拖延國軍，並要求停止進攻昆明。統帥部為確保人質安全停止攻擊行動，而余程萬於 19 日獲釋返部後，即下令第二十六軍部隊切斷對外通信，且召開會議轉述共軍目前已挾優勢兵力進軍雲南，並以「第二十六軍已處於腹背受敵之境，應立即接受匪偽暫解第十一軍」，[10]、「為國家保存一份實力」為由，於 21 日自行率部隊向滇南撤退。而在轉進途中第 193 師 577 團不願隨軍轉進，率部留置敵後從事游擊。[11]

第八軍自停火後與第二十六軍失去聯繫，因不明當前敵人動態不敢貿然進攻，惟李彌夫人及柳元麟（時任第八軍幹部）仍受困於敵，乃派員前與盧漢接觸要求釋放人質，另將部隊主力後撤回軍指揮所以確保部隊安全。其後，雖妥善完成人質獲釋任務，惟因第二十六師自行南退造成圍城戰線崩潰，加上共軍後援部隊及投共部隊大軍已至，亦僅能放棄既有之戰果分別往滇西、滇南轉進，而在轉進途中竟有擔任守備任務部隊面對追敵不戰而降，導致

喪失部分陸軍總部直屬單位，所幸第八軍主力尚能安全撤退，而第二十六軍於 27 日轉進途中接奉國防部要求於滇南佔領陣地拒止共軍，並提出「一、繼續留住滇南，與匪周旋；二、空運海南島；三、進入越南」等行動，余程萬軍長向國防部回覆採取第二案並獲國防部同意。

第八軍於 28 日撤退途中再度與第二十六軍取得聯繫，對於國防部指導之行動則採取了與第二十六軍不同的第一案「繼續留住滇南，與匪周旋」並奉命戍守滇南。[12] 此時中共要求所部「只可在李彌、余程萬之先頭阻止其向越、緬前進.....以免該敵過早退入越南」[13]，故中共第二、四野戰軍協力向滇南前進，同時在盧漢的幫助下企圖阻止國軍跨越滇越、緬邊境，企圖將國軍部隊殲滅於中國境內；[14] 1950 年 1 月 16 日第二十六軍於蒙自機場完成第一梯次撤運，惟共軍業已追趕至機場外圍，第二梯次撤運南海行動終因情勢所迫，無法繼續執行而兩軍因駐地分散無法與敵決戰，經過商討後決定「.....所有地面部隊，爾後相機向元江南岸轉移，誘致匪軍分離後，乘其通過地障之際，強行與之決戰」。並將第二十六軍沿蠻板及建水、新街之線轉進渡紅河，第八軍沿建水、石屏、元江之線轉進渡江。[15]



圖二：向越緬國境轉進國軍經過概要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七冊戡亂後期(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年)。

因轉進期間第二十六軍部隊遭敵偽冒國軍部隊混入，雙方混戰後損失慘重，為分散敵人追擊壓力將部隊區分兩翼向南退卻，而在行軍期間通信聯絡中斷並遭共軍尾隨襲擊，造成主力進入越南，一部（以 93 師師長葉植南及 278 團羅伯剛部隊）於 1 月中旬由車里、佛海、南壩一帶退入緬甸，蠻洞、打洛地區因籌措軍糧短暫停留，幸得當地華僑協力及自身勉力湊集費用維持生活；第八軍自蒙自撤退後，遭追躡共軍襲擊主力被殲滅，最後撤入緬境僅第 237 師之 709 團李國輝部。[16] 另外曾在中日戰爭期間進入滇緬的遠征軍，於戰後復員留駐定居於滇南地區的地方自衛團隊也追隨國軍進入緬北地區。上述入緬部隊在 2 月底於大其力周邊會師集合後，成立臨時指揮部下轄 3 個縱隊，並成為我「雲南反共救國軍」主幹。[17]

三、李彌時期歷次重大游擊作戰及國際壓力下部隊撤走

李彌於率領部隊往邊區撤走期間，陪隨時任參謀總長顧祝同（1893-1987）多次往返於西南地區會談軍務，並飛往臺灣向蔣中正先生述職報告西南地區局勢，最後於 1950 年 1 月 15 日自蒙自離開後因機場遭共軍佔領而留滯於臺灣。[18] 滯臺期間多處奔走，廣邀志士能人及雲南籍專家共同前往邊區，號召反共志士。並於 4 月 13 日飛往曼谷，負責擬定滇南游擊計畫及籌措軍費等事宜。經過多方協調後，除聯絡雙江、雲景、耿馬、孟定等地之反共志士外，更爭取獲得滇緬邊境之野人山之土人部落支持。是年 12 月 14 日由泰國曼谷前往位於緬甸的孟撒（司令部）主持幹部會議及檢閱部隊，並於隔年 1 月奉國防部命令改組為「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

(以下簡稱反共救國軍),並往返於曼谷接洽與外界聯絡事宜。

直至 3 月初,得到來自於我國及美國政府所支援武器、彈藥物資,同時由騰衝、龍陵、保山、耿馬、滄源、鎮康、瀾滄等地的游擊部隊或代表紛紛加入反共救國軍,其後更在 9 月開始獲得美國按月援助的 7 萬 5 千美元,終使在偏遠艱苦的國軍能獲得金錢及物資支援。迄冬季,反共救國軍官兵達 1 萬 4 千餘人,並佔有北起密支那、八莫、臘戍以東,南至泰、寮兩國邊境之廣大土地。[19]

(一) 大其力作戰

1950 年 2 月,由李國輝(1910-1987)及譚忠(1901-?)所率領自滇南突圍之第八軍二三七師七〇九團、第二十六軍九十三師直屬部隊及其第二七八團國軍部隊,自雲南輾轉撤至緬甸境內大其力後,起初是為了保存僅有戰力,待整訓整補完畢後,相機反攻大陸,緬甸政府初期亦不與以為意,後因中共開始對緬甸政府施壓,企圖出兵驅逐緬境內國軍。造成緬甸政府原想以消極態度漠視國軍暫棲邊境問題,又深怕中共進入緬境後扶持緬共建立新政權,所以決議自行以軍事武力處理,緬甸除透過外交途徑,請美國要求我國政府將部隊撤離外,並在 6 月 13 日起以飛機掃射轟炸國軍陣地,同時也實施數次進攻。

此時國軍由李國輝指揮,遵中央「在滇、緬、越、泰邊區堅持游擊,不得向任何一方繳械,並相機向滇南發展」[20]指導,多次與緬方政府、軍隊談判,在多次努力與照會無果後,基於自衛與緬軍發生軍事衝突。緬軍自 6 月 13 日以空軍轟炸李部陣地,地面攻擊於 18 日開始發起惟均遭國軍擊退。時至 8 月 21 日緬軍終因連戰皆敗向國軍提出談判,希望反共救國軍撤離大其力進入山區,並協商進入山區後提供

糧食。李國輝為確保軍隊爾後發展及顧全大局狀況下答應協商,[21]大其力之戰終告結束國軍則遷至猛撒。大其力戰鬥之後,奠定了國軍部隊在滇、緬、泰邊境的地位,更讓美國開始重新評估國軍的戰力與存在價值。

(二) 反攻雲南作戰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後,國際局勢隨之改觀,美國為牽制中共兵力於大陸西南,先派遣第七艦隊協防臺灣,同時主張「由國軍對大陸沿海展開游擊攻勢,企圖降低中共發動侵略戰爭的力量」[22],後又派爾斯金將軍(Gen. Graves B. Erskine, 1897~1973)至東南亞地區尋求東南亞各國的支持;李彌獲得消息後透過駐泰國武官陳振熙與之聯繫,並於 9 月 8 日安排於曼谷與見面洽談。經過三次會談後獲得美方支持,為避免違反國際法「必須在部隊進入大陸國境後,才方便在大陸地區進行空中補給」。同年 11 月中共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半島正式參與韓戰,美方透過「白紙方案」規劃爭取泰國政府支持,於 1951 年 2 月開始透過美、泰外交掩護為中繼站,對反共救國軍實施軍事援助。我國防部在同年 2 月亦透過美國協助運送軍品至泰國轉送至反共救國軍。[23]

反共救國軍在獲得國府與美國援助後,依據國防部策頒「大陸游擊作戰方案」所指導「大陸游擊部隊,以牽制匪軍兵力、消耗匪軍戰力之目的,其組織應以不脫離生產而保持地方性之游擊部隊為主,採取小股活動方式,不集結、不建立根據地……」[24],於 4 月 14、16 日區分南、北兩路自緬甸猛撒向雲南進軍(李彌率領北路軍)。迄 5 月 21 日前,兩軍已分別進入滇南續向滄源(北路軍目標)、瀾滄(南路軍目標)發起總攻,並於 24 日攻佔滄源、耿馬、雙江及瀾滄等縣,同時接手管

理相關縣府行政事宜；反共救國軍在行軍期間即接收大批愛國志士來歸，並於佔領目標後以共軍及中共地方幹部為目標實施掃蕩。時至7月下旬共軍集結大軍反撲，反共救國軍被迫轉進再次退入緬境。[25]

(三) 國際壓力下反共救國軍撤走

李彌有鑑於反攻雲南作戰失利，故於退回緬境後積極招募新血進行部隊整訓，並與當地吉仁族(Karens 亦有稱克倫族)、蒙族(Mons)合作，以獲得地方支援。此舉在中共眼中有如芒刺在背，因而在1952年1月2日照會緬甸政府施加壓力促使緬方驅逐反共救國軍出境，同時表示可派兵協助驅離行動。惟緬方深恐共軍入境後留滯軍隊或建立地方政權，故拒絕其出兵援助條件，但仍於28日由緬國外交部長在聯合國大會上指控泰、美、華等國秘密支援緬境內的反共救國軍，並要求友好國家協助驅離。[26]

美國在此壓力下自4月即停止對反共救國軍之每月7萬5千美元援助，而有鑑於美援狀況斷續不佳，加上自臺灣空運物資費用過於昂貴，更加積極發展與克、蒙兩族交往；直至是年8月，李彌雖奉國府「為免影響國際關係，希仍飭李部停止與吉倫族往還」[27]之命需斷絕與地方合作關係，惟事關反共救國軍存續重任，故此期間仍保持與克、蒙族交流，另向總統蔣中正先生極力請求准予「1.免自緬南撤軍；2.准予海運軍品與人員來緬」[28]並獲得准許。

而美國方面亦在隔年3月提出「1.中國政府立即命令李彌部隊，停止對緬甸城市及緬甸軍隊之一切攻擊；2.同意撤出最大可能之軍隊；3.制止自緬甸境外，再有裝備給養到達李彌部隊」[29]等三項建議。緬甸政府亦於此時向聯合國大會提出李彌部隊侵略案，控訴李彌部隊與反政府

組織煽動該國內地趨勢力，涉及侵害緬甸領土主權。

李彌部隊雖獲國內支持續存於滇緬邊區發展反共活動，但囿於當時海運經費實為初遷臺灣之政府經濟及能力之負擔。加上聯合國受蘇聯(含親共國家)強力要求及美國撤援下等壓力下，幾經協商及努力仍無效後。聯合國大會決議由中、美、泰、緬等四國於1953年5月在曼谷成立軍事委員會，共同規劃反共救國軍撤退事宜。自11月7日開始實施撤離至1954年5月7日完成共三階段，共撤離官、兵、眷6895人，政府撤離任務終告結束。[30]

參、「黃埔精神」內涵與軍校創建

「黃埔精神」源自於黃埔軍校，如欲探討「黃埔精神」，其中與軍校之創建經過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下藉由瞭解黃埔軍校創建背景，體認「黃埔精神」之內涵。

一、建校(民國13年)前中國情勢

民國創建之初，原有清朝政治經革命破壞，中國處於混亂的局勢，而1912年1月1日孫中山(1866-1925)先生在南京任職大總統一職，因無軍事武力的依靠，雖建立合法中央政府形成中國統一局勢，然事實上，中央政府權力僅能掌握長江下游各省，各省份為了滿足地區需求而建立地方政權，北方則控制在袁世凱(1859-1916)權力下，中部各省則受黎元洪(1864-1928)影響。在這種缺少實質力量並加上地方(袁、黎兩派)勢力拒不接受中央命令的狀況下，孫中山先生為促成中國統一讓位袁氏。[31]

1918年適逢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歐洲列強在國內經濟蕭條、百廢待舉狀況下，將其貪婪目光投向中國，藉各項不平等條約在中國享受各種經濟特權，而中國在戰後「華盛頓會議」[32]爭取之平等，最後仍無法獲得列強支持。而國內許

多企業因遭戰爭影響，加上外國所開設企業享有之經濟特權，等同雪上加霜狀況下紛紛倒閉，對中國經濟、民生產生巨大影響。

國家內政紛亂至此，加上外國在中國所享有之諸多不平等待遇影響，孫中山先生藉助廣東地方軍閥陳炯明（1878-1933）及仕紳支持下建立新政權，亦獲得國會選舉為大總統，[33]並透過創報設刊作為，發揚「三民主義為基礎的現代化國家」改革理念，但陳氏仍然懷抱舊制的「粵人治粵」之狹隘傳統思想，[34]三民主義因無軍事力量推動革命事業，所有軍事行動僅能藉未接受主義思想薰陶的軍閥實施，終究無法成為以國家為中心的革命軍，陳氏在孫中山先生指揮「北伐」[35]期間為個人私利與叛亂勢力吳佩孚（1874-1939）勾結叛變，迫使孫中山先生離開廣東至上海避難。

爾後雖平定叛變事件，但由上述事件可見，陳氏所部與其他地區軍閥均以自身利益為主，如此軍隊無法為新中國帶來希望，民國之創建「結果只有民國之年號沒有民國之事實，像這樣看來中國革命 13 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個空名，所以中國 13 年的革命完全是失敗.....」[36]。因此，創建屬於國家的軍隊、致力於維護國家、人民福祉乃民之所望，若無信念堅定的革命軍，則無法推行三民主義，故孫中山先生決心建立武力，重新革命。[37]

二、黃埔軍校創建經過

民國初創經過袁氏凱專政、徐世昌通日賣國、陳炯明軍事叛變等等亂事，凸顯出中國紛亂的政、軍狀況，而民國政府更已然遭軍閥控制。有鑒於此，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認為「時局至此，勢非改造不可，而吾黨則肩負此改造之重責也」[38]，故於 1923 年決心推動改革，並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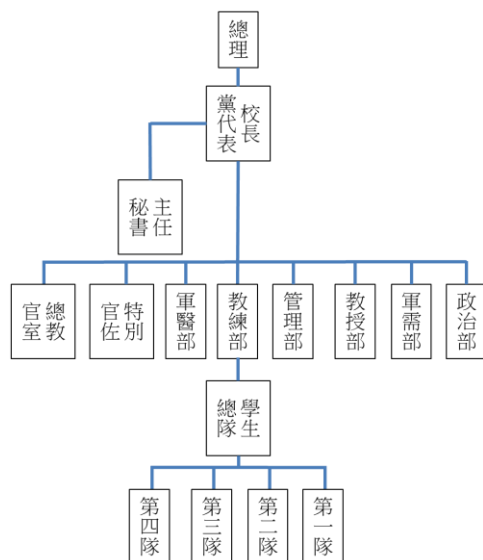
同年 10 月黨務討論中，通過了由陳安仁（1890-1964）提出於廣州開設講武堂提案，為黃埔軍校之創建開啟了先聲；另派遣於陳炯明叛變期間，隨侍在側的蔣中正先生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俄國考察，[39]希能透過汲取他國革命力量建立經驗，以完備創校工作。

孫中山先生在組織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中，針對黨務改組工作預先整備，其中黃埔軍校籌備事宜在會議中多次討論。為能貫徹革命，孫中山先生力薦當時仍在俄國考察的蔣中正先生擔任黃埔軍校校長，[40]待 12 月 5 日蔣中正先生返國後，隨即致電蔣先生迅速前往廣州主持黃埔軍校籌建事宜，特別倚重蔣中正先生赴俄考察所見及俄國革命之經驗與建立之關係，為黃埔軍校爭取 270 萬元及每個月補助 10 萬元的資金援助；[41]爾後於 1924 年 1 月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中除決議新政綱及政策外更一致決議通過創設黨立軍事學校，[42]任命蔣中正先生兼任籌備委員會委員長，由王伯齡、鄧演達、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宋榮昌等 7 員為籌備委員，[43]負責籌辦建校相關事務，並指定距離廣州約 40 里之黃埔島為校址，軍校原定名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學校位於黃埔島上故又簡稱「黃埔軍校」。[44]

孫中山先生期盼黃埔軍校師生均能瞭解三民主義，成為具備新軍事知識的革命軍。故針對軍校招生審查、幹部甄選標準訂定十分慎重、嚴格，相關人員除通過舉薦、填具履歷並通過嚴格審查考核外，並需通過考試合格及複試後始可任用；[45]學生招考方面，當孫中山先生決定創建黃埔軍校後，雖國內有志青年感受國際列強對我欺凌及不滿軍閥亂政而踴躍報考，但各地軍閥為確保地方自身利益及其兵員之

鞏固，對於軍校於各省招生事宜多有阻攔，故招生事宜密託「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各地代表散發「軍官學校招生通告」，並代為招生。所幸，當時青年學子均能堅持愛國抱負及理念，不辭辛苦、排除萬難前往廣東黃埔軍校應考。[46] 最初報考人數高達1千2百餘人，經過國文、算數（外加三角、幾何、代數）等初試測驗及複試後，最終於6月16日開學，當時開學典禮學生總數為499人。[47]

黃埔軍校係為革命而生，革命環境急迫需要革命之幹部造就，故軍事、精神教育需於短時間培育革命幹部。因此，孫中山、蔣中正先生對於軍校學生（以後簡稱軍校生）之期盼及重視，藉由安排黨國先進蒞校定（不定）期講話，對軍校生循循善誘之行為可見一般。[48] 以培養擔當革命幹部為目的前提下，在師資遴選部分，除了學、術科需專業素養外，對於個人品格、操守、思想均經過詳細考察。最後師資核定由何應欽擔任戰術總教官，錢大鈞、胡樹森、陳繼承、文素松、沈應時、陸福廷、嚴重、王俊、劉峙等人為軍事教官，汪兆銘、胡漢民、邵元沖等人為政治教官，上述人員皆為一時之選。並由孫中山先生擔任總理，另設黨代表一職由廖仲凱擔任，與校長共理校務。[49]



表一：陸軍軍官學校組織系統表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整理自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編〈黃埔本校組織沿革〉《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稿第一冊—組織之沿革》，（廣東黃埔：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編，1960年），頁1-2。

三、「黃埔精神」的陶鑄與內涵

「黃埔精神」雖是經由蔣中正先生闡述為「犧牲、團結、負責」，卻是源自於孫中山先生革命的精神。孫中山先生在軍校第一期學生開學時的講話中提到「學革命先烈行為……，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為國奮鬥」，由此所體現出做為國家革命軍人必須有犧牲生命不怕死的精神；如同推翻滿清革命運動中，歷次都以人數劣勢革命先烈赤手空拳及手槍、炸彈面對擁有優勢兵力、武器的清朝軍隊，發揮了「用一個人打一百人，用一百人打一萬人」不怕死的團結精神，雖然經過數次的失敗，但革命先烈犧牲所換取的是更多地區人民響應起義，對革命事業來說犧牲已達成目標，也逐漸影響有志之士形成了革命的動力。更在演說中強調，創建黃埔軍校就是要建立革命軍，「革命軍是救國救民的軍人，……都擔負得救國救民的責任」。[50] 這種以國家、人民為己任的態度就是負責的精神。上述訓詞內容可視為歷史使命之賦予，凡軍校生入校後即堅定信守，「黃埔精神」根源即源於此。

蔣中正先生而受孫中山先生所託擔任校長亦以身體力行「黃埔精神」，更於1923年8月奉命赴俄考察返國接任籌備軍校事宜後，為求與胡漢民、汪兆銘共事能團結一心而致信與商行止問題，書信中謙虛的道出自身個性、行為上的缺點，並期望能「為吾同志所深諒也……而以慈愛至誠待之，則弟或能久安於事，雖有困難拂意之遭，亦必能忍耐堅持」。[51] 由上述內容可見，蔣中正先生所強調之「黃埔精神」亦為自身所奉行，而此言行合一之行徑均為孫中山先生所見及重視，故委以創建軍

校之重責。

同時為確保黃埔軍校幹部能善盡本務、克盡職責，蔣中正先生分別於 1924 年 4 月 26、27、28、30 日對所有幹部講話，期能藉由多次與幹部的溝通來闡明，黃埔軍校所培育幹部、人才係為「實行三民主義，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獨立國家，使中國的民族成唯一個真正的自由民族」之理念。並強調「軍校猶如自己家中兄弟手足一樣，必定是意見融洽，毫無隔閡.....」以培養國家重要幹部為共同目標，亦再三說明身為幹部對於自身所肩負「職務、責任、地位」之重視及榜樣，最後更對幹部中經過醫官審查體能（格）較差人員免除幹部職務，同時藉由幹部篩選，將學識不足人員撥歸學生隊參加學習。[52] 上述可見，黃埔軍校創校過程筆路藍縷，但對於軍校師資、幹部遴選並未因環境窘困而降低標準，反而因創建之時代背景乃國家動盪之際更肩負國家、人民之重任與期待而更加要求其標準。

軍校創校之教育目的在建立一支以主義為思想、以國家及人民為己任的革命軍。在當時險惡的革命環境中，必須以「速成的、特殊的、應變的、時代性的」教育為訴求來教育軍校生，而這種教育從軍事、政治及精神教育等層面來著手，軍事教育著重於「形式的訓練」、政治及精神教育偏重於「精神和思想的訓練」並強調三位一體的重要性；為了能達到速成效果，蔣中正先生特別注意「嚴」的教育方針，具體來說即為「軍紀」的要求，從日常生活中對於軍紀的要求，「由外而內，先形式上訓練起來，在慢慢地引導到精神上面去」。[53] 訓練出看破生死、視死如歸的革命軍，這種「黃埔精神」的灌注對於往後軍校教育、生活中，及部隊作戰相互之間的同袍情誼有莫大的作用，也期能藉軍

校訓練過程循序漸進的培育軍校生團結的精神。

對於軍校生的精神、思想教育方面，蔣中正先生在 5 月 8 日報到後第一次對軍校生講話，開宗明義就向軍校生闡明「今天是全校同志相見的第一天，從此之後，我們同志而兼為同學同胞，亦就是我們同生死第一天的紀念日子」，字裡行間表現的不是長官部屬的主從關係，而是出上下同欲的革命精神，其中所強調彼此間同志即為同袍的緊密關係、及同生共死的意念，傳達了「黃埔精神」所培育軍校生團結的精神；其後更以當前國際情勢對中國所造成「衰敗、剝削、凋殘、禍亂、飄搖橫流的裡頭」狀況，來闡述國家動盪之際需要軍校生這群有志之士來挽救危亡，黃埔軍校的創立則由此而生，而「本黨要辦這個學校的目的在此，本校同志的責任亦在此」亦說明了培育軍校生負責的精神；但在人數上，當時軍校生與當時各地軍閥人數相比較之下不及千分之一，故革命軍人的職分、目的「只有一個死字，除了死之外，反面說就是偷生怕死，如果偷生怕死，.....不單是不能作軍人，而且是沒有人格，就不能算是人」，[54] 由上述講話中即灌輸軍校生「黃埔精神」中，「犧牲」的意義與內涵，亦可見其重視與重要性。

為了灌輸軍校師生進入黃埔軍校後同生死共患難的革命精神，根據史料所記載內容，蔣中正先生自接任校長職務後每日勤於校務工作推展、規劃及軍校生學習與生活紀律管理，隨時與俄國顧問議事。並藉由制頒「連坐法」來訓練軍校生對紀律的服從性，同時加快對於「團結」的精神體認。且強調全體師生以「同志」[55] 互稱，期藉由稱謂來拉近彼此距離獲得團結之效。其中值得令人學習的是蔣中正先生以身教代替言教的教育方式，例如在一次

夜間緊急集合視察部隊時，因自身「鞋履不正，為部下窺視，不勝慚惶」而特別在日記中記載，檢討自身未能為軍校師生表率以為惕勵，[56] 由此展現出其以身作則及從生活小處做起行徑，成為培育軍校生體現「負責」之最佳表率。另外透過《黃埔訓練集》、《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等書籍內容，蔣中正先生重視對黃埔軍校師生精神教育，以黃埔第一期學生為例，每隔1至2日即安排實施講話，而講話內容更包含精神思想教育、生活教育及訓練教育等面向。

綜觀黃埔軍校教育，施教時間甚短，但透過倡導「黃埔精神」的教育氛圍下，培養出軍校生威武不屈、誓死不降的價值觀，也藉此建立學生對於三民主義的信仰，並加深黨（國家）與學校的關係。[57] 黃埔軍校創校至今，參與我國歷次重大國外勢力入侵及國內局勢動盪。在此期間，幹部對於國家所賦予任務均能領導所屬奉命唯謹、不計犧牲、英勇殺敵。雖國共戰爭最終因國軍的軍事行動失敗，而失去在大陸地區的政權，但戰爭期間國軍同袍所表現的「黃埔精神」仍時有所聞。特別是1949年國軍主力轉進來臺後，李彌將軍率部於雲南滇緬邊境，配合大陸東、南部沿海各島嶼及西康的國軍部隊相策應，與中共長期的周旋與襲擾。

(四) 李彌及反共救國軍對「黃埔精神」之體現

回顧戡亂作戰期間，李彌奉命前往南麻與共軍作戰，在優勢敵軍兵力壓力下成功解救遭包圍之同袍，並於戰後奉蔣中正先生親電「臨朐之捷，砥定魯局，吾弟功勳，及貴部光榮，乃與黨國同垂不朽」[58] 的褒揚讚譽，可見李彌在黃埔軍校所受教育經過內化後，在戰場上對於「黃埔精神」

的表徵。1949年當時國內、外局勢，實為國府極為艱難、困頓的一年。蔣中正先生在其日記中所述「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臺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什一而已」。上述狀況可見，軍隊內部因有感時局對國府不利，所造成之軍人自危之心理浮動狀況已然成為瓦解軍心毒藥，更造成國家動盪危亡之現實。

而軍隊之所以動亂，乃將領缺乏對國家認同及信心，史料中記載蔣中正先生對於「美國白皮書發表後，各種反動騎牆者皆明目張膽背叛離棄，……其惟在香港四十四叛徒宣言中，有黃埔學生李默庵一人，……此不能視作黃埔生，惟李逆實為第一之叛徒也，可恥極矣」[59] 如此的不肖學生痛心疾首。可見同由黃埔軍校所訓練之軍校生在國家面臨如此巨大橫逆之際，非但無報效國家之心，甚而淪為叛逆之國軍將領。相較之下，李彌同在此大環境中堅定黃埔軍校所教育之「黃埔精神」信念為國家付出，也突顯出個人堅忍的人格特質。

在此種國家生死存亡、諸多將領叛變之際，李彌仍能為國家在邊區艱苦環境下，領導國軍為收復大陸失土而奮鬥。筆者藉由蒐集李彌所率領之國軍於邊區反攻大陸作戰相關文獻，彰顯於其矢志為國的「黃埔精神」。

1. 犧牲

李彌遭盧漢軟禁而脫險歸來後，無懼結髮之妻受制於中共及遭禁錮期間的軟硬利誘與威逼壓力，拋開家事所帶來的憂慮，在國家至上的負責精神下當眾宣布其「誓死反共，願犧牲其為人質之妻室」[60] 決心，重新組織掌握第八軍官兵，並奉中央命令指揮部隊反攻昆明，進攻部隊在李

彌激勵下士氣高昂，作戰攻勢進展順利。其後，雖因鄰接友軍（第二十六軍）自行脫離戰場，導致包圍戰線潰散成為反攻昆明作戰失敗關鍵，功敗垂成而向滇緬邊區轉進；在率部隊進入滇緬邊區過程中，除不斷遭共軍（含投共叛軍）尾隨追擊及側擊外，轉徙路程達三千餘公里且歷時近 4 個月，其艱辛險阻非常人所能處。

抵達滇緬邊區後，李彌返臺向總統蔣中正先生述職，並說明部隊於滇緬亟需援助之窘困狀況。但在此國難之際，國家無論在政治、外交及經濟都面對困難與阻撓。李彌為解決滇緬邊區同胞困苦，縱使國家有難，仍以自身僅有積蓄攜往邊區支持滇緬國軍舊部，成為部隊存續重要支柱；此等犧牲精神若無對國家忠誠之犧牲精神，絕難完成。

2. 團結

轉進入緬境之國軍不僅第八、二十六軍部隊，亦有舉義歸來之士，但當時中共滲透無所不入，又恐有地方與中共友好人員滲透潛伏。對於人員掌握與過濾已是難事，加上領導不同單位部隊所組成的擊隊，使其具有安危相仗、同仇敵愾為共同使命而奮鬥，實為不易。而國軍進入緬甸時，中央受緬政府投訴國軍武力入侵，雖透過外交途徑協調仍無法獲得諒解。故李彌奉國府電令「轉飭各該入緬部隊，撤反滇境，在其統一指揮下，從事有計畫之游擊作戰.....」[61]。惟此時國家適逢政府遷臺諸多橫逆之際，對國軍邊區部隊補給不繼，造成部隊內部離散之隱憂。

幸賴李彌因出身滇西望族熟知滇緬邊區民風，又因「中日戰爭」末期曾與地區內克、蒙族協力抵禦日軍，建立深厚之情誼。加上地區內華僑發揮愛國情操，出錢出力支援故而能獲得使部隊立足資源。在此險惡環境下，充分發會幹部組織功能穩

定內部，並致力於創辦「反共大學」從軍事、政幹、後勤、通信及行政（財務）等項目實施教育。受訓學生對象除針對部隊人員外，亦有寮國、泰國、緬甸等僑生參加受訓，不但藉由教育提升部隊團結及素質，更結合周遭鄰國資源，使部隊在邊區獲得更穩固的生存環境。李彌充分發揮團結的精神與功效，對國軍具有關鍵性的貢獻，功不可沒。

3. 負責

反共救國軍初期在滇緬邊區所執行游擊作戰任務，因國府無力供給部隊補給，故其部隊給養多由華僑援助與地方勢力交涉始能獲得少數物資。李彌發揮擔當責任的道德勇氣，於滇緬邊區及泰國兩地奔走，並規劃遠自臺灣透過海運借道泰國的補給方式對國軍部隊實施運補。即使過程遭受諸多險阻，但在李彌即知即行的強大動力下，加上淡泊名利個性使然，終能獲得部屬信仰、同事信任並驅使部隊轉危為安。

另外，1949 年國府遷臺後，尚有諸多國軍單位（部隊）留滯於大陸地區，其中特別是國防部保密局（前身為軍統局）所推動之「還鄉運動」，造成國軍情報人員（單位）以情蒐、發展敵後工作為由向國府申報經費及資源，但藉此名義行招搖撞騙之實者甚多。時至 1951 年，李彌同時受國府命令調查向中央申請經費、資源之敵後作戰、活動相關作為是否屬實；[62] 而 1953 年底開始，反共救國軍自滇緬邊區實施撤離返臺行動，是李彌在部隊所遭遇現實艱苦環境中，和國際及國家地位等雙重壓力環境下所執行之任務，更肩負來自於長官及部屬及國人的壓力。上述任務無論是受國府之託，調查敵後工作適時狀況。亦或者是在國際壓力下，奉「滇緬邊境部隊.....，在一個月撤退完畢，如再荒廢時

日，逾期不辦，即以違抗命令論處……」[63]之命令撤離部隊及家眷，其過程艱辛不在話下。執行如此艱難任務必須具備強大決心，負責的精神更為決心之基礎，也才能將國家所賦予之使命負責貫徹到底。

精神力為作戰中不可或缺，特別是在環境艱困、物資不足或武器裝備等物質力較敵為差狀況下。綜觀滇緬邊區游擊戰期間，反共救國軍之游擊作戰在劣勢環境下努力立足，精神力尤為重要。雖任務最後隨著中共施壓而撤離，但在李彌領導下完成了建立反共救國軍、反攻雲南作戰及撤離行動，在在顯示以旺盛之精神力面對強大外力的軍人風範，及對「犧牲、團結、負責」的「黃埔精神」體現。

肆、結論

作戰力量並非單純考量兵力多寡，而必須綜合物質與精神兩種力量。其中精神的戰力則包括教育訓練、統御指揮及民心士氣。回顧 1924 年黃埔軍校建軍之初，軍校生以 500 支步槍參加東征、北伐，對抗擁有優勢兵力之軍閥，乃至「中日戰爭」期間面對武器、裝備、數量均優於國軍的日軍。國軍面臨強大橫逆之時刻，雖仍有少數個人因私利而造成敗退，但絕大多數均能以犧牲（不怕死）、團結（守紀律）、負責（不退避）的精神面對也終能獲得勝利，足以證明透過軍校教育可充分發揮「黃埔精神」內涵。因此，李彌在軍校的陶冶下投身戰場，並戮力於戰場上實踐，始可屢次在面對危難之際達成國家賦予之任務，並自返臺後勤於讀書研究，先後進入軍事研究院受訓進修，亦任中央評議委員發揮其所長，畢生為國家鞠躬盡瘁，足為現代軍人之典範。

近年來中共不斷在軍事科技、理論上持續精進及研發，當今威脅我國的中共解放軍，不但人數眾多並佔有武器裝備數、

質量優勢。國軍應認清當今國際情勢及國家、社會氛圍，秉持「黃埔精神」理念朝質精、量少方向發展，積極加強軍事教育訓練。

參考文獻：

- [1] 中正文教基金會，〈民國 48 年 6 月 16 日主持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35 週年校慶紀念會〉，《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7- 演 講 ）（http://www.ccfed.org.tw/ccfed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12:0004-39&catid=184&Itemid=256）
- [2] 本書編寫組著，《黨政幹部統一戰線知識讀本》（北京：華文出版社，2016 年 6 月），頁 24～26。
- [3] 1949 年 12 月，時任雲南省主席的盧漢同時兼任雲南省綏靖公署主任，集雲南省軍政大權於一身。於是月 9 日，假借其職務之權集合中央派駐昆明的軍政首長招至官邸開會，藉機將上述人員軟禁，並於當日發佈「雲南起義通電」投共。參見覃怡輝著，《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2009 年 9 月），頁 15～17。
- [4] 柳元麟述著，《滇緬邊區風雲錄-柳元麟將軍八十八回憶》（臺北：國防部印製中心，1996 年 6 月），頁 87。
- [5]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二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7 年 6 月），頁 45～46。
- [6] 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一輯》（臺北：華岡印刷廠，1988 年 6 月），頁 15～17。
- [7] 覃怡輝著，《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頁 52～58。

- [8] 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臺北:聯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7 月),頁 101~102。
- [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戡亂戰史(十三)西南及西藏地方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3 年 1 月),頁 55~57。
- [10] 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 68。
- [11] 覃怡輝著,《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頁 20~23。
- [12] 第八軍因共軍主力壓迫採取轉進,部隊南撤方向以時任陸軍副總司令湯焄考量第八軍主要幹部均來自滇西,地方基礎亦較熟悉,故而採此方向。參見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 74~77。
- [13] 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北京:新華印刷廠,1993 年 12 月),頁 65。
- [14]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 年 2 月),頁 314~315;另參考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頁 578~579。
- [15] 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 78。
- [1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滇緬邊區游擊戰史(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 年 4 月),頁 7~11。
- [17] 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 54。
- [18] 在盧漢叛變而遭軟禁的第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此時因害怕國府追究責任,逕自經海南島前往香港,不願返回臺灣。參考陸軍一級上將顧祝同將軍著,《墨三九十自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3 年 1 月),頁 276~278;及覃怡輝著,《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頁 101。
- [19] 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 15~17。
- [20] 此時國防部電令滇反共救國軍行動方針內容概述:對外不得向地區內各方勢力繳械,盡量避免衝突;對內應加速整頓、力求團結,並收編陸續由滇境陸續南來之國軍部隊,以厚戰力;補給方面,應力求自立更生,向匪後活動取給於匪。參見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 13~14。
- [21] 反共救國軍進入緬境後,國府因局勢動盪無力提供部隊相關作戰支援。僅能依靠當地華僑、與地方市立協商後勉強能在困苦環境下立足。故緬軍提出願意以反共救國軍進入山區,換取資源補給條件下而退出大其力。參見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 62~71。
- [22] 陶涵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下卷)》(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3 月),頁 569。
- [23] 「白紙方案」係因美方為化解在朝鮮半島戰場上所面對「志願軍」的軍事壓力,其內部向總統所提出「支援李彌部隊進攻雲南,以牽制中共部隊」

- 的軍事援助方案；該方案於 1951 年 2 月初開始執行，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透過陳納德創立「民航空運隊」載運，將美軍位於日本沖繩基地的武器裝備送至 CIA 於泰國所設立的「西方公司」，再轉運至緬泰邊境交由反共救國軍（此時已改組為反共救國軍）接收，而自 9 月起每月提共 7.5 萬美元援助，直至隔年 4 月停止。參見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 72～73。
- [24] 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 22。
- [25] 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 79～88。
- [26] 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 122～123。
- [27] 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 62。
- [28] 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 103。
- [29] 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 63。
- [30] 反共救國軍撤離共區分三階段，1953 年 11 月 7 日至 12 月 8 日為第一階段，撤離官、兵、眷共計 2600 人；1954 年 2 月 14 日至 3 月 19 日繼續實施第二階段，撤離官、兵、眷共計 3475 人；1954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7 日繼續實施第三階段，撤離官兵 820 人。惟此期間緬方藉意指我士兵為緬人，及封鎖主要交通要道等方式迭次阻撓，導致撤離期程間斷、延宕。參見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 81～82。
- [31] 孫中山先生在南京政府就職時，時任陸軍總長黃興（1874-1916）所屬軍隊約 5 萬人，為與袁氏謀求共和、實現民主政治，而解散其部隊。參見張玉法主編，《現代中國史》（臺北：經世書局，1980 年 4 月），頁 43-46。
- [32] 「華盛頓會議」係指 1921 年國際間因一戰後許多問題尚未能於「巴黎和會」解決而召開，而中國亦受邀參加共同討論中國問題，並於會中提出廢除「二十一條」、「撤銷在中國特殊利益範圍」及「改訂不平等條約」等內容。參見林明德著，〈華盛頓會議與中日關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978 年 5 月），第 6 期，頁 447-448。
- [33] 1912 年開始，國民政府因無建立軍事武力導致政權實為北洋軍閥袁世凱所掌控。直至 1918 年開始，國民政府全力培植廣東地區地方軍閥陳炯明（1878-1933），並視其部隊為國民黨軍之基礎。參見呂芳上著，〈總統 蔣公與黃埔軍校的創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報》，1976 年 4 月），第 4 期，頁 2。
- [34] 張玉法編，《現代中國史》，頁 104-106。。
- [35] 此時期之「北伐」係為 1922 年 3 月孫中山先生以大元帥身份向徐世昌（1855-1939）的北京偽政權出兵，徐氏政權之軍事力量由皖系軍閥段祺瑞（1865-1936）所支持。參見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二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年 11 月），頁 94-95。
- [36] 中央陸官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

- 稿》(第一冊),頁 1。
- [37] 袁守謙、黃杰著,《黃埔建軍》(臺北:裕台公司,1971 年 5 月),頁 9。
- [38] 孫中山先生認為民國創建乃以國民黨之推力所促成,但民國創建迄十二年後,軍閥、官僚、政客朋比為奸,撥弄政潮,以致內亂頻仍,政變迭起,國幾不國,若再不有所作為,一切辛苦肇建將為之斷喪殆盡。參見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二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年 11 月),頁 129。
- [39] 毛思誠著,《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一)》(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36 年 10 月),頁 274。
- [40]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九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年 11 月),頁 69。
- [41] 陶涵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卷)》(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3 月),頁 62。
- [42] 袁守謙、黃杰著,《黃埔建軍》,頁 16。
- [43] 朱瑞月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一部:建校建軍與東征北伐)》(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2 年 2 月),頁 69。
- [44] 黃振涼著,《黃埔軍校之成立及其初期發展》(臺北:正中書局,1993 年 6 月),頁 52-55。
- [45] 軍校幹部甄選十分嚴格,通過薦豹、甄選、考試的 50 員中,複試後至少淘汰約 26 人,除顯示校長對幹部條件的嚴格要求外,亦可發現中國軍事教育水準的低劣現象。朱瑞月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一部:建校建軍與東征北伐)》,頁 71-72。
- [46] 呂芳上著,〈總統 蔣公與黃埔軍校的創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報》,第 4 期,頁 2。
- [47] 朱瑞月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一部:建校建軍與東征北伐)》,頁 74-75。
- [48]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十至十二輯精裝合訂本)》(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 年 10 月再版),頁 2-3。
- [49] 呂芳上著,〈總統 蔣公與黃埔軍校的創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報》,第 4 期,頁 9。
- [50] 唐振楚編,《國父演講選集》(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 年 8 月),頁 168-173。
- [51] 毛思誠著,《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36 年 10 月),頁 337-339。
- [52] 毛思誠著,《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 347-351。
- [53] 第一期軍校生僅在校訓練 6 個月時間,區分學、術科方面,為能在短時間養成革命鬥士,以術科中「戰鬥教練」、「實彈射擊」二項最為重視。參見朱瑞月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一部:建校建軍與東征北伐)》,頁 152-160。
- [54]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十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 年 10 月),頁 9-14。
- [55] 所謂同志意指全校均為以主義為中心、生死與共、安危相同的志同道合者。
- [56] 《蔣中正日記(手稿本)1917-1936》(未刊本),1925 年 1、2 月,頁 78-80。
- [57] 呂芳上主編,《國軍與現代中國》〈從黃埔訓練集看蔣中正對黃埔軍校學生的教育訓練〉(臺北:國力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5 年 4 月),頁 73-106。
- [58]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二冊)》,頁 164-165。

[59]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臺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年12月)，頁422-423。

[60] 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63。

[61] 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85。

[62] 抗戰結束後，軍統局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該局以抗戰時所奠定情報據點為基礎，將工作對象轉移為中共。然

在國軍戰況失利狀況下，各地據點相繼後撤，故而改變組織布建原則，推動「還鄉運動」，鼓勵敵後工作人員返回原籍或具特殊社會關係之地區，在中共解放區內組織新的游擊力量，伺機遂行反共活動，其中以毛森在泰國所主導之敵後工作為最。參見覃怡輝著，《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頁77-87。

[63] 林孝庭著，《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48》，頁80。

The Operation Of 1950 Myanmar Border Area Led By Gen.-Lee-mi Explore The CONTENT And Practice Of「Whampoo Spirits」

Tsung-Lung Tsou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rmy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Abstract

1949.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aced both challenged from communist forces in country, and portion of force led by Gen. lee-mi set foot at Yuan-nan and Myanmar border area to establish anti-communist base. Under such difficult circumstance, nationalist forces kept on fighting without further support. All members despite of officer or enlist, strongly follow guidance of Whampoo spirits to fight against Myanmar government forces and communist force at Myanmar-China border area , conducted counterattacks to mainland China aggressively, and recovered Yuan-nan area. However, due to pressure from communist force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ssues, our government relocated to Taiwan. Because their determined countattack sustained, our flag still flies high on mainland China.

1959. The primary content of 「Whampoo spirits」 was announced to all members of National revolution army by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which the 「Whampoo spirits are sacrifice, united and responsible.」. Those standing creed of 「whampoo spirits」 were deeply implanted into all cadets, when the military academy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assure all cadres to carry through commands issued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gainst communist and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se assured history of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Whampoo spirits, Yuan-nan and Myanmar border area, Gen. lee-mi